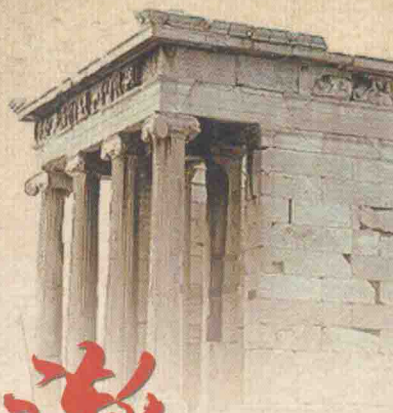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LAOXUEZHE WENKU



# 东传西渐

——中西文化交流史散论

*Dong Chuan Xi Jian*

*Zhong Xi Wen Hua Jiao Liu Shi San Lun*

许明龙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LAOXUEZHE WENKU

# 东传西渐

——中西文化交流史散论

*Dong Chuan Xi Jian*

*Zhong Xi Wen Hua Jiao Liu Shi San Lun*

许明龙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传西渐: 中西文化交流史散论 / 许明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161 - 5394 - 9

I. ①东… II. ①许…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  
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K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6650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宋英杰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5  
插 页 2  
字 数 421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次

## 上篇 沟通中国与欧洲的桥梁

- 试评 18 世纪末以前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 ..... (3)
- 卫匡国在华行迹再探 ..... (18)
- 与众不同的耶稣会士  
——傅圣泽 ..... (33)
- 中法文化交流先驱黄嘉略  
——一位被埋没二百多年的文化使者 ..... (47)
- 关于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评价问题 ..... (67)
- 关于法国大革命消息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 ..... (79)
- 梁启超的法国大革命观 ..... (91)
- 黄嘉略与孟德斯鸠 ..... (105)
- 中国学界近年来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之管见 ..... (121)

## 中篇 中国在欧洲的形象

- 《马可·波罗游记》与中国在欧洲的影响 ..... (141)
- 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 (149)
- 17、18 世纪欧洲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及其后果 ..... (167)
- 18 世纪法国思想家对中国专制主义的褒贬 ..... (182)

并非神话

- 简论 17、18 世纪中国在法国的形象及其影响 ..... (197)
- 试论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变形”问题 ..... (212)
- 18 世纪欧洲“中国热”退潮原因初探 ..... (220)
- 18 世纪法国思想家论中国的“德治” ..... (240)

## 下篇 孟德斯鸠与中国

- 略论孟德斯鸠的贵族政治思想 ..... (259)
- 孟德斯鸠不是封建叛逆
- 重读《论法的精神》 ..... (271)
- 作为历史学家的孟德斯鸠 ..... (280)
- 孟德斯鸠学说的传入及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影响 ..... (296)
- 孟德斯鸠笔下的中国 ..... (307)
- 严复与孟德斯鸠的《法意》 ..... (322)
- “五四”以来中国对孟德斯鸠的研究 ..... (342)
- 小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之本意 ..... (365)
-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 (370)
- 《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的作者应是孟德斯鸠
- 与米格尔·贝尼泰兹教授商榷 ..... (390)
- 孟德斯鸠究竟做过什么官 ..... (407)
- 重温孟德斯鸠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批判 ..... (411)
- 后记 ..... (418)

# 上 篇

---

## 沟通中国与欧洲的桥梁



## 试评 18 世纪末以前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

明清之际大批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国外学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多。新中国成立前，陈垣、陈受颐、阎宗临等学界名流也多有论著。1957 年朱谦之先生任教北大时，着手修改他于 1940 年出版的旧作《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将此书的“前论”作为讲义印发，文中有关耶稣会士的论述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在此后的两三年间，《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批文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针对朱先生认为耶稣会士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来华耶稣会士被定性为“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一支先遣队”<sup>①</sup>。除了朱先生 1959 年发表的两篇答辩文章外，此后 20 年间，鲜见不同意见。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大有改观，不但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数量大增，而且初步形成了不同意见争鸣的局面。<sup>②</sup> 近十余年来，对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个体研究较前深入，研究范围也正在不断拓宽，但是对耶稣会士的群体研究，较之当年围绕朱谦之先生的观点而展开的论战，无论在论点或论据上，尚无多少新的突破。

朱杰勤先生在为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关于耶稣会士的性质，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经过

---

<sup>①</sup> 《新建设》，1958 年 9 月号，第 15 页。

<sup>②</sup> 何桂春：《十年来明清在华耶稣会士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1992 年第 5 期。



及其作用等问题，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及世界史者所不容忽视的。”<sup>①</sup>朱杰勤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目前对耶稣会士的个体研究和专题研究，推进了明清之际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使之具有坚实的基础，但要回答朱杰勤先生提出的问题，则需要把耶稣会士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这个问题阐明自己的一点浅见。

### （一）关于分期问题

关于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分期问题，有几种不同意见，各有其理由。我主张分为三期。第一期从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1580年）到南怀仁去世（1687年），以下几位都是在这一期中比较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金尼阁、艾儒略、汤若望、卫匡国、闵明我、柏应理、南怀仁。为耶稣会士入华探路的沙勿略虽早在1552年就到了珠江口外的上川岛，其后范礼安于1587年到达澳门，为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作具体准备，但他们均未在中国进行过传教活动，所以我把1522年到1580年视为序幕。第二期从白晋等五名法国耶稣会士抵达北京（1687年）到钱德明去世（1793年），以下几位都是在这一期中比较著名的耶稣会士：白晋、张诚、马若瑟、冯秉正、宋君荣、蒋友仁、傅圣泽、钱德明。钱德明死后虽然还有两名耶稣会士继续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但他们已无任何值得一提的活动，所以我把1793年到1815年视为尾声。1834年，耶稣会士开始再度来华，由此开始了第三期，此后来华耶稣会士的性质、动机和作用，与前两期相比均有重大差异。本文仅讨论第一期和第二期，即1580年至1793年之间的在华耶稣会士。

### （二）关于背景和动机

耶稣会是以反对宗教改革运动、重振天主教会、维护教皇的绝对权

---

<sup>①</sup>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威为宗旨的组织，对于它在欧洲历史上的反动性，我国学者从未有过歧见。但是对于入华耶稣会士是否“殖民主义侵略先锋”，他们的活动是否“文化侵略”等问题，至今仍见仁见智。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否则难免失之偏颇。

从经济上看，早期欧洲殖民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从 16 世纪起开始走向衰败，逐渐落在英、法等国后面。到了 17 世纪，英国虽然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体系尚处在形成过程中，工业革命迟至 18 世纪中叶以后才真正起步。法国的经济此时与中世纪相比，并无多大差别，工业生产依然以大量手工业作坊为主，离资本主义工业化尚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反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末已经出现，市民经济曾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战乱虽然使经济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但清初的几位皇帝沿用汉族统治者行之有效的政策，诸如蠲免赋税、奖励开荒、兴修水利等，使农业生产较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尽管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并无重大突破，但高度发展的自然经济却逐渐走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与刚刚起步走向近代经济的西欧国家相比，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明显地有过之而无不及。耶稣会士们在中国见到的，不是非洲和南美洲的原始和落后，而是令他们惊诧的富饶和繁荣。

从军事上看，海上东西航路打通之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早期殖民国家，继在中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南部的殖民扩张屡屡得手之后，又把军事侵略活动推进到中国沿海。但是，除了澳门被葡萄牙以贿赂和欺骗的手段窃据而与中国政府共管外，一度被这些国家占领的中国领土台湾和其他沿海据点，都被中国一一收复。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保卫领土完整。

在这种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对比之下，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不可能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它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与中国通商而已。何况，从政治上来看，当时的中国政府领有全部主权，任何外来势力都没有力量干涉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任何一个来华的传教士都不可能凭借他们派遣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恰恰相反，他们只有低三下四地求得中国政府的准许、默认和宽容，才有可能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中国政府一旦禁教，他们便只能乖乖地溜

回澳门。

最早向海外殖民扩张的国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向海外派遣传教士的也是这两个国家，这说明，这两件事情之间确有紧密的联系。但是，就本文论及的时期而言，这两件事情之间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如上文所述，葡萄牙和西班牙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因实力不足而不能得逞，而比这两个国家更强的另一个殖民主义国家——英国，却在这段时间中未曾派遣任何传教士来华。实际上，传教士来华不仅与派遣国有关，更是罗马天主教会的需要。因为，在宗教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天主教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大大缩小，亟须通过向欧洲以外地区的传教活动，扩大其势力范围，以弥补在欧洲失去的地盘。第一期和第二期耶稣会士来华总的历史背景虽然大体相同，但具体的历史条件却有所不同。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海外扩张中的冲突，导致“教皇子午线”的划定，不久后冲突再起，1529年缔结新约，将西班牙属地的西界定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从此，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远东地区，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葡萄牙对该地区拥有独揽传教事务的“保教权”。1540年，耶稣会士沙勿略·方济各奉教皇之命东来，在日本进行了多年活动后，试图进入中国，未获成功，死在珠江口的上川岛。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交纳地租建屋居住后，澳门教区即告成立。此后，传教士接踵而来，开始向澳门的中国人传教。起初，他们把在南美洲推行的那套办法搬来对付中国人，规定“凡欲进教保守者，须葡萄牙化，学习葡国语言，取葡国名姓，度葡国生活”<sup>①</sup>。这种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行径，在南美洲可行，在中国却行不通。另一名传教士范礼安以巡视员身份到达澳门后，发现了这个问题，汲取耶稣会士在日本被逐的教训，力主改变传教方法。随着罗明坚、利玛窦的到来，开始了耶稣会士来华的第一期。

葡萄牙长期独领“保教权”，澳门教区的主教必须由葡萄牙政府推荐的葡萄牙神父担任；东来的传教士，不论其国籍，均需从里斯本搭乘葡萄牙船只，经由澳门赴任。这种做法不但引起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满，

<sup>①</sup>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69页。

也削弱了罗马教廷对传教事务的控制。何况葡萄牙无力派遣足够数量的本国传教士，却又对别国派遣的传教士横加阻挠。针对这种情况，罗马教廷于 1622 年设立传信部，直接组织和管理海外传教事务。为了使来华非葡籍传教士不受制于澳门主教，教廷又在中国推行宗座代牧制；宗座代牧由罗马教廷委派和任命，分别署理中国不同地区的教务，不受澳门教区管辖。首批被任命的三位宗座代牧全是法国人。此时葡萄牙的国力日衰，而法国则尚处在路易十四的强盛时期，极欲扩大它在远东的影响，夺取葡萄牙在远东的地位。耶稣会士来华的第二期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的。

生活在具体的狭小环境中的人，不一定对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有自觉而清晰的认识。来华耶稣会士虽然都肩负着为他们的国家和罗马教廷扩大势力范围的使命，他们踏上艰险的旅途时，为的却是传布福音，拯救生灵。

在第一期中，葡萄牙的“保教权”虽然尚未受到严重挑战，但来华传教士中葡萄牙人并不占多数。以 1616 年为例，当年在华的 15 位耶稣会神父中，葡萄牙人仅 5 位。<sup>①</sup> 第一期中，影响较大的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等都非葡籍。这些非葡籍耶稣会士虽然都是经葡萄牙当局批准来华，并且受葡萄牙人的管辖，但他们却从未将为葡萄牙的利益服务视为来华传教的目的。他们来华的经过和在华的活动表明，他们来华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上帝和教皇服务，在中国传教，使中国人皈依天主教。他们的祖国当时都是欧洲的小国或弱国，有的尚未统一，他们不可能在中国为自己的祖国争得任何具体的利益。葡籍耶稣会士虽然兼具上帝的使臣和葡萄牙国王的臣民双重身份，在华维护本国的利益，但主要也只是保护“保教权”，巩固其在中国教务中的霸主地位。由此可见，葡籍耶稣会士来华的主要动机，也是传教。

第二期来华耶稣会士中不少是法国人，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卫青心神甫在谈到法国耶稣会士时写道：“这些伟大的传教士既是上帝的

---

<sup>①</sup>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名录》（J.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en Chine de 1552 à 1800*），巴黎，罗马，1973 年，第 329 页。

使臣，又是法国国王的非正式代表，同时也是欧洲自然科学的盗火者。”<sup>①</sup> 卫神甫这段话道出了法国耶稣会士来华的三个动机。第一，他们之所以冒九死一生的危险，远涉重洋来到中国，首先是为了弘扬基督教。第二，白晋等首批来华耶稣会士不是由罗马教廷，而是由法国国王派遣的，政府负担他们的旅费和年金。为他们的祖国服务，当然也是他们来华的动机之一；具体地说，他们要尽力削弱葡萄牙的在华势力和影响。正因为如此，他们来华时，既不经由里斯本，也不搭乘葡萄牙船，而且避开澳门，选在宁波登陆。关于第三个动机，即开展科学研究，需要在下面略为多说几句。

路易十四虽然对内专制独裁，对外穷兵黩武，于文化和科学事业却很热心。财政总监柯尔伯为发展科学研究和向远东扩张，首先想到了耶稣会士。1680年，他为此事召见巴黎天文台长卡西尼和耶稣会士洪若翰时说道：“神父，科学不值得你们远涉重洋、背井离乡，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但是，教化众多的生灵，使之皈依耶稣基督的宏愿，却常使你们作此种旅行。希望你们珍惜这种机会，宣教之余在当地进行大量考察，使科学和百工臻于完善。”<sup>②</sup> 话说得很婉转，很策略，但让耶稣会士来华作科学考察的意图是清晰的。被选定的6名耶稣会士在学问方面都有较高造诣，其中4人是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路易十四发布诏令，授予他们“国王的数学家”的头衔，携带大量书籍和科学仪器以及在中国建立科学院的使命来华。需要指出的是，路易十四和柯尔伯交付的科学考察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海外扩张服务的。法国驻里斯本大使在向葡萄牙国王禀报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一事的信中写道：“我王决定派遣6名耶稣会士经暹罗、澳门到中国。他们的使命是在海陆途中测量经度、磁针的倾角和变化，以及一切能改善地图和航海的事项。”<sup>③</sup>

以上事实表明，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耶稣会士来华确实都与派遣国

① 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黄庆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② 比诺：《中国与法兰西哲学精神之形成》（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第1卷，巴黎，1932年，第40页。

③ 博西埃尔：《安多平施》（Yves de Thomas de Bossière: *Un Belge mandarin à la Cour de Chine aux 17e et 18e siècles*），巴黎，1977年，第38—39页。

的扩张政策有联系。现在的问题是，包括通商和派遣传教士在内的这些活动，对于中国来说，是否已构成殖民或侵略。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在内的欧洲当时的强国，对当时比它们更为强大的中国，虽不乏殖民和侵略的欲望，但不具备殖民和侵略的实力，而只能寄希望于通过贸易来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和捞取利润。中国政府虽实行严厉的海禁，贸易却禁而不止，重要原因之一是商人有利可图。欧洲的官商和民商在对华贸易中虽然不择手段，屡有欺诈和海盗行径，但这种不当的贸易行为并非以政治或军事压力为后盾，而且也不危及中国的主权。中国人不是在外国势力的逼迫下，而是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贸易的。因此，从总体上看，这是正当的、互利互补的国际贸易。再从贸易的具体内容来看，不是欧洲国家向中国倾销廉价工业品，而是中国向它们输出价廉物美的商品。欧洲国家没有可供向中国输出的大宗商品，只得以大量白银换取它们所需的茶、丝、瓷等。这种情况与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开路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是大不相同的。中国政府当时对外国势力的抵制，也并非反抗侵略和殖民。马克思在评论 17 世纪清朝政府的排外政策时写道：“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sup>①</sup>至于此前明朝政府的闭关政策，则与倭患有直接关系，这早已得到公认。

至于耶稣会士，他们的心态与他们的国王和教皇的扩张企图之间，也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葡籍和法籍耶稣会士虽具有强烈的愿望为各自的国家利益服务，并因此而争斗不休，但其实际行动却亦仅限于通过传教扩大本国的影响，几乎无人直接参与对华贸易，更不必说配合政治和军事行动了。对于他们来说，传教就是为教皇和国王效力的具体行动。

综上所述，我认为：既然中国并未遭到欧洲国家的侵略，那就没有理由说耶稣会士是“侵略先锋”。在我看来，一部分耶稣会士是仅为传

---

<sup>①</sup>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7 页。

教而来的传教士，另一部分则是既为传教也为国王效力而来的传教士。如此而已。

### （三）关于活动和作用

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在许多著作中已有详细的介绍，无须赘述其细节。我把他们的活动概括为四项：一、传教；二、为皇帝和宫廷服务；三、向中国传授西学；四、研究并向欧洲介绍中国。

传教是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和首要任务，其余活动都与此有关或为此服务。对于下层平民，传教主要以口头方式进行。对于上层官员和文人，传教主要以著书立说的方式进行；这些诠释基督教教义的著作，成了我们今天研究中西文化冲撞和交流的珍贵文献。

为皇帝和宫廷服务，对于耶稣会士来说，包含着双重意义。首先是为了站稳脚跟。他们深知中国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倘若不能讨得皇帝的欢心，不但可能被赶走，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其次是企图以皇帝为突破口，将整个中国基督教化，并进而使中国的周边国家基督教化。白晋在向路易十四的报告中说得非常清楚：“如果这位君主（指康熙——笔者注）改信天主教，必将收到人数堪与全欧洲匹敌的辽阔的中国改变信仰的可喜成果。继而，由于中国周围各国国民向来崇拜中国文化，遵从中国的格言与习俗，所以他们也将仿效中国，皈依天主教，从而体现康熙皇帝改信天主教的巨大影响。”<sup>①</sup> 耶稣会士提供的服务，项目繁多，包括传授西学、任职钦天监、参与外交谈判、铸造火炮、测绘地图、建修园林、伴驾巡幸、修理钟表和仪器、绘画奏乐、医治疾病等等。他们以这些服务为代价，换取了许多优待，使他们即使在禁教时期，仍能安全地留居北京。

在传授西学方面，明末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等人，与此后的耶稣会士略有不同。利玛窦等人交游的对象多为名士，他们介绍和传授西学的目的在于显示才学，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名望，

<sup>①</sup> 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进而诱使中国名士认识、研究乃至信仰天主教。一言以蔽之，是自我推销。他们人数虽少，但经由他们而传入中国的西学所产生的影响，却不亚于继他们而来的为数众多的耶稣会士。自汤若望与顺治皇帝结成忘年交后，传授西学的对象由主要是名士变成了主要是皇帝，其性质也自我推销变成了智力服务。除了天文历算和制造火炮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外，传授给皇帝的西学很少越出宫墙。通过传授西学传教，既是天主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独具的特色，也是耶稣会士有别于其他修会在华传教士的一大特点。

在研究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方面，第一期与第二期也不尽相同。在第一期中，来华前对中国知之甚少的耶稣会士们“发现”了中国的辽阔幅员、众多人口、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等，深感若能使中国人归化，对于天主教会来说，其意义不可估量。但他们势单力薄，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亟盼获得教廷和欧洲各国的支援。为了争得支援，利玛窦、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柏应理等耶稣会士，用西文撰书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儒教、民情习俗等。这些著作并非科学研究成果，但在欧洲出版后，却极大地帮助了欧洲人了解中国，并由此揭开了东学西渐的序幕。在第二期中，耶稣会士们除了继续向欧洲介绍中国外，开始并日趋深入地推进对中国的多方位研究。这种研究的动力来自三方面：一、天主教会内部延续百余年之久的中国礼仪之争；二、欧洲非教会学者对中国的巨大热情和汉学的兴起；三、法国政府科技政策的鼓励和支持。来华耶稣会士增多，皇帝和宫廷所需服务量减少，耶稣会士汉语水平提高，从而为这类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这类研究在第二期后期成绩斐然。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在社会人文方面，涉及历史、哲学、语言文学、宗教、政治、法律、音乐、绘画、民俗和某些少数民族等，其中对中国古籍经典的研究尤其用心。白晋的《易经》研究引起康熙皇帝的重视，特诏另一名耶稣会士傅圣泽进京襄助一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研究的深度。关于耶稣会士对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以往仅述及天文、数学和大地测量。其实，第二期后期的耶稣会士在其他方面花了很大工夫。1776年至1814年间在法国陆续出版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16巨册，在华耶稣会士巴多明与法国学者的大量通信，北京耶稣会士寄给曾任财政总监和国务秘书的贝尔坦的大量书信和报告，都包含



了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自然科学的许多研究成果，范围相当广泛，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动物、植物、医学、药学、农业、化学、冶金、纺织、军事技术以及园艺、交通等应用技术，几乎无所不包。这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与传教脱钩，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这与初期为推进传教而研究中国很不相同。

关于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我国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在史实方面并无多少争议，在总体评价上却分歧较大。我只想就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简要地陈述我的见解。

世界是一个整体，但在新航路发现之前，东西方之间仅有少量的商旅往来，基本上处于彼此隔绝互不了解的状态。欧洲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为耶稣会士东来提供了机遇。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从此突飞猛进，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我们把视野从中国历史扩展到世界历史，那就应该承认，耶稣会士最重要的历史作用，就是为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传递了信息，架设了桥梁，从而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冲撞和交流。他们的这种历史作用，无论对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洲，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是从耶稣会士来华开始的。利玛窦为中国带来了第一幅世界地图，《明史·外国传》关于欧洲数国的记载中，一些准确可靠的叙述大多是耶稣会士提供的。李之藻、王徵等明代中国学者赞誉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有我中国昔贤所未谈及者”、“悉皆发此中从来所未有”。由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显然有别于中国的儒释道，这就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应该说，在世界历史上，这是中西文化首次大规模的正面接触和交流，为中国人提供了认识世界、重新审视自己，进而走向世界的机会。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中国传统思想对外来文化的巨大抗力，这次接触和冲撞没有在中国产生任何真正深刻的影响，我们失去了一次走向近代、走向世界的机会。反观欧洲，耶稣会士传过去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对于欧洲人来说，同样是闻所未闻，同样为他们提供了认识世界、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可以说，当时的欧洲成为了中西文化首次大规模接触和冲撞的另一个场所。欧洲文化中心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圣经》对于世界历史所作的解释遭到了怀疑和否定。中国的范例向欧洲人揭示：一个没有基督教的国家，也可以创造高度的文明，也可以具有高尚的伦理道德。于是乎，在